

□ 专题文论

中俄关系

中苏(俄)对抗和结盟的历史启示与两国关系最佳模式的选择

邱海燕

【内容提要】中俄互为最大邻国，中俄关系对两国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影响着双方的安全和发展。一百多年来，中苏(俄)关系经历结盟和对抗的曲折路程。历史证明，中苏(俄)和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但中苏(俄)结盟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俄找到了适合两国关系发展的最佳模式，建立起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走上了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中苏(俄) 对抗和结盟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D822.3.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3-0034-0008

一、中苏对抗的困境

(一) 中苏在20世纪20年代的对抗

20世纪20年代中苏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交错。中国军阀和蒋介石政权对苏维埃政府怀有敌意；而苏联政府对华实行的悖反政策更加深了中苏关系的裂痕。在国家关系方面，苏联先是一边与北京政府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一边与孙中山联系，支持国民党；后又大力支持国民革命运动，推翻北京政府，打倒奉系军阀张作霖，主张建立有工农社会基础的亲苏政权，最终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在党际关系上，苏联重国民党，轻共产党，但出于共同的信仰和实现世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却又把共产党看作是自己人。这种“双重标准”最终导致了20年代苏联对华政策的失败。

发生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是中苏早期对抗历史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后果更是对两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俄政权面临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日本也参与其中。为突破外交困境、改善国际环境，苏俄积极寻求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先后三次发表对华宣言，但在放弃沙皇俄国侵占中国权益的立场上却逐渐后退。在中东路问题上，第一次对华宣言提出“无偿归还”；第二次对华宣言则提出“另订条约”；1923年5月4日，苏联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重申了前两次宣言的精神。同年9月2日，加拉罕到达北京。加拉罕来华肩负双重使命，一是解决中苏历史悬案问题，二是支持国民党人推翻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加拉罕抵京后施展外交手段，终于在1924年5月31日与北

【作者简介】邱海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签署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①和《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②。同日,中苏互换建立邦交照会,恢复外交关系。由于中国军阀割据,《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东北得不到执行,于是,苏联政府与张作霖于1924年9月20日签订《奉俄协定》^③以使有关中东路的协定条款得以施行。北京政府先是不承认《奉俄协定》,后无奈于该协定已既成事实,于1925年3月18日照会加拉罕,《奉俄协定》取代《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成为中苏两国的正式文件。

《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签订后,苏联积极支持广州政府进行北伐,推翻北京政府,并以打倒张作霖为主要目的。这更加剧了北京政府和张作霖对苏联的反感。

1924年中东铁路局局长伊万诺夫支持倒戈的张作霖部下郭松龄,引起张的不满。1926年,奉系军阀采取了逮捕伊万诺夫等行动。针对奉系军阀违反《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奉俄协定》做法,苏方提出强烈抗议。此事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恶化的肇端。但在事情的处理上,中苏双方都有所退让,使局势得以缓和。因为苏联对华政策的核心就是反张,所以此后尽管苏联对中东路政策有所调整,缓解与东北当局的关系,但张作霖并没有停止其反苏、反共的步伐,并于1926年7月赶走了时任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1927年2月安国军^④扣押苏联轮船“纪念列宁”号,同年4月安国军搜查苏联大使馆,导致苏联撤使。苏联撤退驻华使馆使苏联公开和秘密的对华工作受到很大削弱。但苏联并没有采取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报复措施。北京政府也不想与苏断交,于是中苏两国维持着单方面驻使的关系。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政府下令对苏联驻各省领事一律撤销承认,所有各省苏联商业机关一并勒令停业。苏联领事馆和商业机构很快撤离各地,只有东北地区还保留苏联领事馆。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遇难身亡。张学良子承父业接管东三省大权。同年12月东北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为了与南京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为了响应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主张,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警察当局以“第三国际在领事馆开会”为名搜查了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逮捕了与会人员。中东路上的苏籍负责人几乎全部被抓。事情发生后,张学良

及时向南京汇报,其做法得到积极的肯定,并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解决善后问题。而苏联政府也迅速做出了强烈反应,提出严重抗议,递交照会,要求按照外交惯例放人,归还被搜去的文件钱物。6月上旬苏联在与东北接壤的边境搜捕、迁移华侨,表明其在为动武做准备。但蒋介石、张学良等人并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苏联一直对蒋介石、张作霖的挑衅隐忍退让,使蒋介石误认为苏联不会动武。此其一,另外,在蒋看来,如果与苏联断交,则会切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有利于巩固他的全国政权。

中苏围绕中东路产生矛盾的原因是《中苏协定》和《奉俄协定》签订后,一直没有召开中苏会议,按照协定解决中东路问题。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则为张学良解决中东路问题提供了时机。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准备武装夺取中东路。7月7日晚,蒋张会谈,10日蒋决定武力接管中东路,甚至不惜与苏断交。当天下午,东北政务委员会下达了早准备好的夺取中东铁路及其设施的命令,逮捕铁路苏籍员工,捣毁铁路工人组织和合作社,逮捕了路方200余名苏联公民,其中包括中东路正副局长在内的60人被驱逐出中国国境。苏方空缺下来的职位由中国人或白俄分子充任。同时东北当局还控制了中东路的通信系统,接收了苏联远东贸易公司、纳夫瑟信托公司和苏联商业汽船公司。这就是中东路事件。7月13日,苏联向国民政府提出

① 简称《中苏协定》或《中俄协定》。协定主要内容是:两国复交;协定签字后一个月内举行中苏会议,商定解决悬案之详细办法;苏方废除帝俄与中国及第三者订立的一切有损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苏联承认中国在外蒙拥有主权,并将尽数撤退苏军;两国内不得有反对对方政府的机关及团体存在;两国将重新划界;确认中东铁路的商业性质,只由中俄两国负责,除路区营业事务外,路区内有关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各项事务概由中方办理;苏联放弃俄国的部分庚子赔款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租借地,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两国订立商约时,关税税则采取平等互惠原则,等等。

② 简称《暂行协定》。在中苏会议根本解决中东铁路问题前,两国为共同经营该铁路业务规定暂行管理办法。

③ 全称《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政府与苏维埃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奉俄协定》在完全坚持《中俄协定》和《暂行协定》关于中东铁路的规定的同时,又在协定中将中东铁路归还期限缩短了二十年,并将《中俄协定》及附件中关于中东铁路须由日后中苏会议商决的赎路问题的规定,改为自签订《奉俄协定》之日起,中国有权赎回该路,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中国悬而未决的赎路权利。此外,中国还收回了失之很久的在中国黑龙江下游的航行权等。

④ 1926年初奉系与直系重新联合,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同年11月,为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张作霖组织安国军,自任总司令。1927年6月,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国军政府。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逼近京、津,张作霖败退出关,安国军政府瓦解。

最严厉的抗议照会，限三日答复。17日南京政府一口回绝了苏方的要求。同日，苏联照会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议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苏联国境。19日苏方撤回苏驻黑龙江领馆工作人员及中东路员工。20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布撤回驻苏使馆人员。至此中苏断交。在中东路事件后的交涉中，中国当时面对苏日两方的压力。因为东北对外交涉权已交还中央，张学良只能与苏联进行“局部交涉”。但蒋介石一直采取强硬态度，破坏了中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可能。在蒋游说众列强无效^①后，允许张学良自行解决善后交涉，不必拘泥于中央。但这时苏联已做好了战前准备。1929年10月12日，苏联发动了为夺取中东路的中苏边境战争，战争持续到11月27日。这场战争以东北军战败而告终。据张学良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当时打此仗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东北的地位。但战争失败后，蒋介石又不让他管和谈之事，他反被整得很惨^②。此时，张学良已顾不得蒋介石不得局部交涉的成命，命令蔡运升与苏展开全面和谈。随后蔡又被委任为中央政府代表，双方于12月22日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③。但南京政府对善后结果不满意，复谈未取得任何结果。

根据1905年的《朴次茅斯和约》和《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日本和沙俄分据中国的南北满。日本根据《朴次茅斯和约》附约在南满驻军。这支部队逐渐扩大，连同日本驻旅顺口的部队发展成日本的关东军。中东路事件引发的边境战争使东北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恢复作战能力，并打破了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日本有机会乘虚而入。1931年日本爆发经济大危机，为了转嫁国内矛盾，日本加紧侵华步伐。关东军于1931年9月18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南满。鉴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要和边境战争后中苏之间的敌对，苏联采取了“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无所忌惮，于1932年2月5日占领了中东铁路枢纽地区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境被日本占领。同年3月9日，日本以长春为都建立伪满洲国，把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及内蒙古东部划归管辖，拉出清朝废帝溥仪为“执政”。把关外广大“满蒙”地区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伪满洲国的建立鼓励了日本侵华的野心，侵华的矛头由关外指向关内。同时，以前的中苏边界变成了日苏边界，苏联的远东领土

继十月革命后又一次面临日本的威胁。“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一直谋求与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都遭到日方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开始检讨其对华政策。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日本因此变本加厉，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而蒋在谋求国联和英美干预无效的情况下，转而与苏和谈。在日本的紧攻下，中苏于1932年12月12日闪电复交。中苏复交后，苏联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对日绥靖的态度。1933年起苏联准备向日本出售中东路。1935年苏、日、满三方在《中东路买卖协定》上签字。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和利益完全被日本所排挤。

（二）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分裂、对抗

中苏两党、两国的分歧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两国关系走向破裂。60年代中苏关系的分裂、对抗主要围绕中苏大论战和边界问题展开。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恶化，使边界问题凸显。这种对立波及了两国外交、经济合作等各个方面。

中苏大论战争论的焦点是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有资格当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这就涉及领导人的政治生命。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提升。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这个问题影响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关系。由于中苏大论战关系到两国领导人的政治命运，所以论战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在论战中，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实行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攻击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中方批评苏方倡导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战略思想是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妥协。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中苏两党的观点针锋相

^① 蒋曾想通过美国等“非战公约”签字国对苏联施加压力，使之接受既成事实。但南京政府一直没有拿出服人的理由，使本来就反感中国“革命外交”的列强更加不满，更不可能帮助蒋介石了。参见杨奎松：《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② [美]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351—352页。转引自薛衔天、金东吉：《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③ 1929年中苏边境冲突发生后，中苏议和谈判达成的协议。内容要点：按照《中苏协定》、《奉俄协定》恢复铁路冲突前的状态；争议问题交之近期中苏会议解决；双方释放因此次双方冲突而逮捕的两国公民；中东路苏籍员工恢复原职；中国解除白俄武装，并将其首领等驱逐；恢复苏联领馆、营业机构；中国在苏的商业机关因冲突而停业的予以恢复；中苏会议定于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中苏双方撤兵，恢复国境和平状态。

对。1959年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用老子党的口吻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对一下表。”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以赫鲁晓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对中共实行突然袭击。为了对中共施压，赫鲁晓夫于1960年7—9月召回全部驻华苏联专家，把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苏共二十二大，赫鲁晓夫进一步系统化了“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纲领路线，同时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的观点。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苏共二十二大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①。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苏美妥协，中国认为这是赫鲁晓夫对美帝退却，对其大加批判。对1959年与1962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苏联表面中立，暗中援助印度，中苏关系雪上加霜。经过与苏联在内政外交上的一轮较量后，中国的外交战略更加“左”倾。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毛主义”派别的出现，中共的观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多的拥护者。之后，中苏大论战愈演愈烈，中苏关系逐年恶化，到1965—1966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彻底分裂，中苏两党断绝了关系。

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两国边界矛盾也急剧升温。1960年8月中苏在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地区爆发边境冲突后，两国之间边界纠纷不断。60年代初中国新疆和苏联的边界基本上属于有边无防的状态。从1954年起，苏联每年都在该地区迁返苏侨。中苏交恶，特别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苏联不仅加快了迁返苏侨的步伐，而且大力煽动新疆边民到苏联去。1962年4月到5月间，中苏边界发生伊塔（伊宁和塔城）事件，苏方直接介入中国边民的外逃。到5月30日，在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下，苏联边防军被迫停止接运伊犁外逃居民，封锁了边界^②。伊塔事件虽然发生在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据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伊犁地区人民的生活安排仍然可以达到“三七开”，即吃30%的细粮，70%的杂粮^③。因此生活困难并不是发生伊塔事件的主要原因。1963年起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增兵。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种紧张的形式使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发生转变，外交战略由集中反帝，调整为既反帝又反修。同时对国家军事防御战略进行调整：由单一

对美转变为双向的既对美又对苏。此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苏互视对方为假想敌，终于酿成了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8月在新疆的铁列克提地区中苏又爆发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同年中苏两国总理的机场会晤为中苏边境紧张形势的缓和提供了机遇。1969年10月20日，根据两国总理在北京达成的协议，中苏双方重新开始边界谈判，到1978年这场谈判无果而终。1969年珍宝岛战争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名存实亡。这也给中苏美三角关系带来新的变化，中美两国客观形成了共同的战略利益。毛泽东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由反美反苏到联美反苏。中美两国都看到了这一历史契机，双方积极努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先后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提出“一条线”和“一大片”^④战略思想。从维护中国安全利益出发，促动国际力量的重新组合，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对付“北极熊”——苏联。尽管无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名义上中国都没有与西方国家建立战略联合，但“一条线”战略在当时起到了牵制苏联的作用，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接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划分”^⑤的观点，此理论最初是反对美苏两个霸权主义，但是面对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中国外交上由反对两霸，到集中反对苏霸。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1979年4月3日，中国决定不延长1980年4月11日期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于当天照会苏联政府，建议中苏进行国家关系谈判。直到1985年前，中国一直不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直接出兵阿富汗，中美扶持塔利班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苏联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在中越对抗中支持越南。

① 沈志华、于沛等编著：《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563页；《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84、83页。

② 伊犁州档案馆，11/1/114，第112页。转引自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③ 杨国、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④ “一条线”是指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大致处在同一纬度的各国。“一大片”是指亚非拉国家。

⑤ “三个世界划分”：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即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和拉丁美洲都是第三世界。

二、20世纪中苏的两次结盟

(一) 中苏的第一次结盟

1941年4月13日《苏日中立条约》^①的签订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之前，中国以争取苏联援助、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为对苏外交战略的出发点。但苏联面对德日两面威胁，以分化德日同盟、避免两线作战为外交之重。因此苏日关系制约中苏关系的发展。苏日缔结《中立条约》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②失效。中苏关系的迅速变冷，并没有使中国的抗战陷入困境，而是带来了新的契机。《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能够将兵力向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延伸。美国意识到中国是牵制日本的主要力量，于是迅速调整对华政策，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英对日宣战，9日中国对日德宣战。中国同美英法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不仅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而且由于担负起境外作战的任务，国际地位也迅速提升。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国家宣言》的签署，使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中国与美、英、苏并位于四大国之列。虽然如此，但四国关系错综复杂，美国对华政策有其长远考虑：战时依靠中国对日作战，战后依靠中国抗衡苏联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美英需要苏联作为主力承担对德作战；苏联需要英美的援助；美国需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英所求大于苏联需要，美国对华关系服从于美苏关系。苏美英是强国，中国是弱国，弱国无外交，这一点在后来的《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争取苏联对日作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对苏外交战略的目标。中国军队的接连失利更使蒋介石认识到苏联参战的重要性。新疆问题^③，尤其中共因素是蒋介石同意与斯大林交易的关键。罗斯福和蒋介石在反复探查斯大林对中共的看法后，得出令他们满意的结论：斯大林对中共是不信任的。1945年2月4—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争期间的第二次会议。2月11日，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秘密签订了《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其中规定：在德国败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一）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二）日本于1904年背信弃

义占领的俄国权益须予恢复：1. 苏联收回库页岛南部及其附属岛屿；2. 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3. 旅顺港作为苏联的海军基地；4. 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须予苏联优越权益，中国保持在满洲全部主权。（三）千岛群岛交给苏联。1945年6月15日，蒋介石才看到载有《雅尔塔协定》的备忘录，确认了中国被美出卖的事实。但面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强势及斯大林对蒋领导权的肯定，蒋介石隐忍地接受了协定。1945年6月30日起，宋子文奉命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进行关于《雅尔塔协定》的谈判。为了让苏联保证不支持中共，蒋介石提出舍“一北”（外蒙古）保“二北”（新疆和东北）的方针。宋子文据理力争后无奈遵命行事，双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母约与子约的关系。事实上，苏联并不担心蒋介石撕毁中苏条约，因为苏联在东北的利益已从关东军手中直接夺得。《雅尔塔协定》又早已把苏联对华所需合法化。但美国在执行对华政策时会考虑到蒋介石的意见。如果中苏条约被撕毁，美国必然会撕毁《雅尔塔协定》。因此中苏条约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蒋介石的预想，起到了约束苏联的作用。另一方面，斯大林最初不相信中共会统一全中国，因此在战后初期，苏联把国民党政权视为主要的合作伙伴，力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支持中共进行武装斗争；不介入马歇尔调停，与中共保持一定距离；

^① 自1931年起苏联就向日本提出了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遭日方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实现其“南进”战略，稳住苏联，向苏联递交了《日苏中立条约》的草案。1940年4月13日苏日缔结《苏日中立条约》。内容要点为：一、苏日友好、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二、如缔约一方与第三方发生冲突时，缔约的另一方将保持中立。所附苏日两国政府《声明》称，苏日互相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该约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② 中苏复交后，中苏就开始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日本进攻华北后，中国谋求与苏联订立互助条约，未能成行。1937年“七七事变”后，苏联主动提出与中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同年8月21日中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要点为：一、斥责以战争为解决国际纠纷之方法，两国不准单独或联合他国进行彼此之间的侵略；二、两国不对侵略对方的第三国进行援助；三、两国之前签订的任何条约不受此约影响。该约针对日本，中苏两国形成准战略同盟关系。

^③ 20世纪30—40年代，苏联一直力图全面控制甚至吞并新疆。1934年盛世才在苏军直接支持下，消灭了对手，掌控新疆大权。盛世才被发展为苏共党员，在新疆实行亲苏、反帝政策。苏德战争爆发后，盛世才投向国民党政府，把苏联势力排挤出新疆。1944年8月苏联利用伊宁、塔城、阿尔泰三区少数民族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派出部队、坦克和飞机，推动“三区革命”。11月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苏联改变对新疆的政策，推动“三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11月双方签署谈判协议，成立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新疆省联合政府。

协助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禁止中共部队公开进入东北大城市，并向国民政府移交这些大城市的行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没有坐以待毙。中共先派兵进入了大连，并在苏联的协助下最终建立了旅大革命根据地。蒋介石也从中看到了苏联对国共两党的真实倾向。但为了不把苏联完全推向中共，蒋介石暂时采取了对苏友好政策。1946年6月中国内战全面爆发。美国出钱出枪支持蒋介石打中共。中共此时也彻底放弃了促美中立的政策。历史充满巧合，1946年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为标志，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拉开序幕；而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从1947年下半年起中共在对蒋作战中从劣势转为优势，苏联也逐渐把对华政策的重心转到中共方面。

(二) 中苏的第二次结盟

1948年起毛泽东提出访苏，斯大林一再推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毛泽东访苏，意味着苏联违反《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举必然损害苏联在华利益。因此斯大林1949年1月决定派米高扬访华与毛泽东会谈。1月下旬，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刚好打完，中共胜利已成定局。1月26日米高扬等人从莫斯科启程到西柏坡。会谈的首要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毛泽东策略地表示了对旅顺、新疆和外蒙古问题的看法。米高扬在请示斯大林后表示：中苏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苏联愿意与新中国结成友好同盟。但是在外蒙古问题上，斯大林以强硬的态度严词拒绝。西柏坡会谈达成的苏联与中共政权结成同盟的意向，与1945年蒋介石与苏联结成的“城下之盟”有实质上的差别。无论从国家利益还是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苏联都需要与新中国结盟。新中国也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次会谈奠定了未来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政治基础。1949年6月刘少奇访苏，举出了处理中苏条约的三种方式：(1) 由中国新政府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不加任何修改。(2) 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3) 由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在适当时机签订新约。7月11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宣布：“新中国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得不如此，待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来莫斯科，即可解决中苏条约问题。”^①为了遵守《雅尔塔协定》，保护苏联在中苏条约中的利益，在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前，苏联一直保持与蒋政权的官方关系。毛泽东访苏之初，斯大林也以担心破坏雅尔塔体系为借口，拒绝与毛泽东签订新约。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同年12月6日，毛泽东启程访苏。经过一番周折，双方于1950年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附属协定。中苏新约的签订，虽然使中苏结成了同盟，但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疑虑却增加了。斯大林为了让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让中国成为在亚洲与美国对抗的前哨，放弃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在华利益并为此感到不快，毛泽东也因《补充协定》^②中的东北和新疆问题而感到不满。在朝鲜战争中，中国毅然出兵朝鲜，这才消除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心，使中苏同盟得到巩固。中苏新约对于中国仍然具有不平等成分。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援助；苏联在旅顺口和新疆的特权直到赫鲁晓夫时期才被彻底废除。朝鲜战争后，中国国际威望的提高和赫鲁晓夫在苏联党内斗争中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这是苏联放弃在华特权的重要原因。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目的之一就是消除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实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莫斯科会议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向了高峰。

中苏关系的转折是在1958年，苏联要在中国建长波电站和与华共建联合舰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毛泽东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干涉。赫鲁晓夫亲自来华解释，但并不能弥合裂痕。同年，中国为反击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和台湾“反攻大陆”的图谋、牵制美国的全球战略，连续对靠近大陆的金门岛和马祖岛发动炮战(简称“金门炮战”)。“金门炮战”事先没有向苏联通报，这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违反了盟友的规则，“金门炮战”是在加剧国

^① 黄峥：《刘少奇的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68页。

^②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规定，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这说明苏联仍然把这两个地区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际紧张局势，破坏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①。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签订的《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方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9月苏联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把中苏意见分歧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同年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年大庆。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印边界问题等进行了激烈辩论。赫鲁晓夫影射毛泽东热衷于战争，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对外战略，中方领导人不同意。中苏同盟至此走向分裂。

三、结论

（一）中苏（俄）对抗与结盟的历史启示

在东北亚的政治环境中，中俄日美四国利益交错。历史证明，中苏（俄）发生对抗，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这一方面会使中苏（俄）两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会给第三方带来渔翁之利。中东路事件引发边境战争，中苏交恶，日本乘虚而入，增加关东军的驻军，抢占苏联的势力范围。战争暴露了中国东北军的虚弱，所以日本才敢在两年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也威胁着苏联的安全。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双方在边境上重兵对峙，甚至发生边界武装冲突。中苏把大量资源用于准备可能发生的战争，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中苏对抗使美国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处于有利地位；与此同时，中苏对抗，日本等亚洲国家和地区乘机做大。

历史还证明，中苏（俄）结盟也不是最好的选择。1945年的中苏结盟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的，中国靠让渡国家主权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苏联击溃日本关东军以后，还想从经济上控制整个东北，中国当局作为主权国家的政府不可能吞下这样的苦果。苏联后来转向重点支持中共，在这种情况下，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同盟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这种同盟关系要求缔约国在内外政策上保持一致。中苏作为两个大国，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一样，怎么可能在内外政策上保持一致呢！观点不

一致，利益不同，这是正常现象。所以说，50年代中苏结盟的基础也是非常脆弱的，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

（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关系健康发展的新模式

历史证明，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以及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立符合中俄两国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世界的和平。正像相关专家分析的那样，从战略层面上看，“只有睦邻友好合作才能够为两国的和平发展营造一个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中俄同处东亚和中亚地区，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够维护共同周边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共同周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俄都是转型国家，面对的问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只有在发展问题上相互配合、相互借鉴，才能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俄都是新兴大国，只有在国际事务中联手合作，才能更加有力地切实推动国际战略平衡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改造、新的全球治理模式的形成；中俄均面临美国及其他不友好势力的战略遏制与挤压，只有相互支持、互为纵深，才能够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国家发展”^②。过去20多年的实践证明，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受意识形态干扰为特点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给中俄双方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中俄关系的最佳模式，也是国际关系史上国家关系的新典范。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遵循“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平等互信”的原则，对对方崛起的战略判断非常积极。双方在政治上互相尊重、经济上互相补充、安全上互相信任、重大国际问题上互相协调，两国努力成为“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建立至今已形成一系列灵活的运作机制。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间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目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在政治领域，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合作内容不断增多。中俄成功地解决了两国边界问题，形成了历史上前

^① [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

^② 王海运：《新时期俄罗斯外交战略走向及中俄关系深化》，载《俄罗斯学刊》2012年第4期。

所未有的睦邻地带。在经济领域,中俄经贸合作经过20年的发展,双边贸易额增长14倍。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两国经贸合作迎来大发展时期,2012年再创新高,达881.6亿美元。在军事安全领域,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带动和促进了军事关系的发展,在安全领域的信任与合作不断加强,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维护东北亚安全秩序上的合作利益与共、责任与共。双方通过互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等方

式进一步加强在教育、文化、体育、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双方在人文领域的合作夯实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基础。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也源于战略上的相互需求,是双方总结两国关系历史经验和教训的结果,是从两国当前和长远利益出发并结合当代世界的特点做出的选择,是中俄关系发展的历史趋势。

(责任编辑 靳会新)

Historical Enlightenment of Confrontation and Align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nd Choice of Best Model of Two Nations' Relations

QIU Haiyan

Abstrac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are the largest neighbors. Their rela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oreign relations for both of them and have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ir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relations have experienced a tortuous journey of alignment and confrontation. History proved that a peaceful coexist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benefited both and a fight between them made both suffer a lot, but forming an alliance was also not the best choice. On the basis of summing up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have found the best model fit for their development and established the relations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on the road of healthy and st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confrontation and alignment; strategic cooperation partnership

Периоды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и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ССР (Россией) и выбор лучшей модели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Цю Хайя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 две самые большие страны-соседа в мире,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ними занимают весомое место во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е каждой из стран, они влияют на их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За более чем сто лет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ережили периоды как дружествен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так и конфронтации. История доказала, что Китаю и России выгодна мирная и стабильная обстановка, а от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страдают обе страны, однако создание китайско-россий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е самый лучший выбор как для Китая, так и для России. Обобщая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в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и уроки,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что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нашли лучшую модель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установили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идут по пути стабильного, здорового и правиль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Китай и СССР (Россия); конфронтация и союз; отношен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артнерства